

西汉敦煌郡长城的修筑

——兼论酒泉都尉、酒泉候官的设置

郑炳林 司豪强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 甘肃 兰州 730020)

摘要: 汉武帝反击匈奴、拓地西北, 促使长城逐步向河西地区延伸。经过研究得知: 敦煌郡长城作为河西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修筑时间应在元封三年(前108)至太初四年(前101)间。在长城修筑完成之前, 敦煌郡主要依靠天田工事与酒泉候官、鱼泽都尉等屯田机构防御匈奴。至太初四年敦煌郡长城修筑完成后, 西汉又开始修筑敦煌西至罗布泊的亭燧, 而同年设置酒泉都尉应负责对这段亭燧与敦煌郡长城西端进行管理。酒泉都尉应以酒泉候官为基础进行设置, 而酒泉候官应是敦煌郡西北部设置最早的候官, 其可考的存在时段为太初元年(前104)至神爵元年(前61)间, 后至迟到五凤元年(前57)为新置的大煎都候官取代。因酒泉候官曾长期作为西汉边疆西北极, 故疑扬雄所谓“西北一候”即指此也。

关键词: 西汉 敦煌郡 长城 酒泉都尉 西北一候

中图分类号: K23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52(2023)02-0001-16

敦煌郡是西汉经营西域的基地, 常有使者、官员、商旅和兵将经此往来^①。同时, 西汉送往西域的军备物资经敦煌郡转运, 西汉与西域间的贸易亦经敦煌郡进行。因此敦煌郡安危不仅关系东西交通道路是否通畅, 还关系到西汉对西域的控制能否得到保障。西汉政府为应对匈奴与南山羌威胁以保障敦煌郡安全, 修筑了南北军事防御体系, 即北部长城和南部南塞。本文主要针对敦煌郡长城问题进行研究, 至于南塞问题我们将另外著文详述, 此不赘言。

学界对河西长城的修筑已有不少论述^②, 其中河西长城修筑过程主要以白音查干“四

收稿日期: 2022-12-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术团队项目“敦煌河西碑铭与河西史研究”(21VJXT002)

作者简介: 郑炳林(1956-), 男, 陕西黄陵人。萃英学者一级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敦煌学、西北区域史研究。司豪强(1996-), 男, 河北宁晋人。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西北区域史研究。

① 参郑炳林、司豪强《西汉敦煌郡迎送接待外客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22年第5期,第124-133页。

② 相关学术史梳理可参樊凡《西汉拓边与长城修建》,梁安和、徐卫民主编《秦汉研究》第5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68-278页;黄永美、徐卫民《汉长城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2年第5期,第40-47页。

段论”^①和吴初骧“五段论”^②二说为代表，二说皆指出河西长城是分段分期修筑的，然在具体分段及每段修筑时间方面观点不同，特别是对敦煌郡境内长城的论述过简，因此对这一问题还有继续深入探究的必要。以下我们将围绕西汉河西长城的修筑历程、西汉敦煌郡长城修筑时间及酒泉都尉与酒泉候官设置等相关问题加以论述。

一、西汉西北长城的向西推进与塞城的设置

西汉初年的西北边塞继承自秦，但较之秦极盛时的西北边塞又有所不如。秦国在春秋时尚为西陲小国，至穆公时始霸西戎。《史记·秦本纪》记载秦穆公“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③。《汉书·韩安国传》记载王恢云：“昔秦缪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时宜之变，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国十四，陇西、北地是也。”^④由此，秦国疆域向西实现较大扩展，一跃成为西方大国。孝公时，“西斩戎之獯王”^⑤。《史记集解》注云：“《地理志》天水有獯道县。”^⑥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2册将獯道标注于甘肃陇西县城东南^⑦。则孝公将秦国西疆扩展至甘肃陇西县一带。至惠文王、武王、昭襄王时期，秦国连续与西北义渠作战。《汉书·匈奴传》记载秦昭襄王时：

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灭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距胡。^⑧

秦灭义渠置陇西、北地、上郡，又于三郡西北界筑长城以拒匈奴。于是，秦昭襄王长城成为秦国西北边塞^⑨。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⑩。至此秦朝西北边疆扩展至黄河，得以沿河筑塞，移民置县。大致而言，此时西北边塞西起陇西郡临洮，沿洮河筑塞北抵黄河，复沿黄河北行至阴山南侧的九原郡。

秦末，“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适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

① 白音查干《长城与汉匈关系》，《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第63-67页。

② 吴初骧《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6-17页。

③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5《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47页。

④ [汉]班固撰《汉书》卷52《韩安国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401页。

⑤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5《秦本纪》，第202页。

⑥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5《秦本纪》，第256页。

⑦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43-44页；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33-34页。

⑧ [汉]班固撰《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第3747页。

⑨ 谭其骧、周振鹤已对秦昭襄王长城走向进行考订并标注于地图之上。详参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第5-6页，秦“关中诸郡”图；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42页，“高帝十二年关中诸郡示意图”。

⑩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323页。

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①。楚汉相争之际，匈奴冒顿单于“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②。“故塞”“故河南塞”皆指秦昭襄王长城。表明西汉初年西北边塞又被迫收缩至秦昭襄王长城一线。

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西汉遣卫青进攻匈奴，“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③。西汉初收河南地，而黄河边塞尚未完全恢复，因此匈奴右部仍常越黄河而袭扰河南地。《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元狩二年（前121）秋：“浑邪王与休屠王等谋欲降汉，使人先要边。是时大行李息将城河上，得浑邪王使，即驰传以闻。”《史记索隐》案：“谓先于边境要候汉人，言其欲降。”^④此处“边”即指西汉与匈奴右部边境，也即李息筑城所在的黄河沿岸。这表明至迟到元狩二年西汉西部边塞已从秦昭襄王长城复推进至黄河一线^⑤。同时，随着朔方郡的设置，西汉北部边塞也推进至黄河以北、阴山南侧地区，恢复到秦朝极盛时期的水平。

元狩二年，浑邪王杀休屠王归降西汉，“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⑥。黄河金城段以西沿南山（祁连山、阿尔金山）至盐泽（罗布泊）的广阔区域大致就是后世所谓河西地区。西汉骤得河西之初，欲招乌孙东归故地，“结为昆弟，共拒匈奴”^⑦。其后张骞出使无果，西汉政府对河西的处置方略才转变为直接治理，于是开始大力推进置郡、筑塞活动。《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元狩四年（前119）漠北大捷后：

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⑧

《史记·平准书》记载元鼎五年（前112）：

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⑨

可见西汉政府于元狩四年迫使匈奴北遁后开始大规模开发河西地区。西汉开发河西之初主要采取了兴修水利、设置田官、派兵屯田等举措。军队的进驻既能促进农业开发，又可防备匈奴侵袭。同时，屯田军队常驻河西自然需要修筑相应军事要塞。这意味着西汉西北边疆及长城亭障开始从黄河沿岸逐渐向西推进，初期推进至今居一线，其后随着酒

①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3492页。

②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3494-3495页。

③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3512页。

④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11《卫将军骠骑列传》，第3550页。

⑤ 尽管西汉收复河南地是在元朔二年，但将实际控制疆域由秦昭襄王长城推进至黄河一线还是经过数年的经营。甚至由“将城河上”观之，即便到元狩二年西汉的黄河边塞依旧不甚稳固，还处在建设阶段。

⑥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845页。

⑦ [汉]班固撰《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第3902页。

⑧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3517页。

⑨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30《平准书》，第1735页。

泉郡设置，河西长城继续向西修筑。

《汉书·西域传上》记载：

其后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①

《汉书·张骞传》记载：

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②

颜师古注引臣瓚曰：“令居，县名也，属金城。筑塞西至酒泉也。”^③关于令居塞修建时间。《史记·平准书》记载元鼎六年（前111）：“数万人发三河以西骑击西羌，又数万人度河筑令居。”^④《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及武帝征发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度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于是障塞亭燧出长城外数千里。时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种解仇结盟，与匈奴通，合兵十余万，共攻令居、安故，遂围枹罕。汉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将兵十万人击平之。”^⑤此次西羌反叛爆发于元鼎五年^⑥，叛羌攻击令居说明令居塞此前已经修筑。《水经·河水注》称令居县“汉武帝元鼎二年置”^⑦。则令居塞修建时间也不应晚于元鼎二年（前115）^⑧。由此观之，元鼎六年西汉发数万人“筑令居”并非令居始筑时间，而是在进一步完善令居的防御体系，很可能即与“始筑令居以西”军事工程相关联。另外，令居屯田活动自元狩四年开始，则令居塞在元狩四年或已初步修筑，用以安顿屯田戍卒，至元鼎二年具备置县条件后得以置县。又至元鼎六年，令居塞再次得到强化。西汉政府不断修筑巩固令居塞的同时，还陆续设置河西四郡，并在秦长城的基础上向西于河西北部修筑障塞亭燧绵延数千里。这表明地处河西东端的令居塞难以完成隔绝胡、羌的战略使命，然其在河西“地空”与置郡之间这一时期，作为西汉西境塞城发挥了过渡作用。西汉可以令居为支点进一步向西修建亭障，这为河西四郡的设置奠定了基础。随着令居塞以西亭障修筑至酒泉及酒泉郡设置完成^⑨，西汉西北边疆便以酒泉郡及其北部长城亭障为塞。并且河西长城沿线诸郡重要节点又设置了一系列塞城。

① [汉]班固撰《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第3873页。

② [汉]班固撰《汉书》卷61《张骞传》，第2694页。

③ [汉]班固撰《汉书》卷61《张骞传》，第2694页。

④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30《平准书》，第1735页。

⑤ [南朝宋]范曄撰《后汉书》卷87《西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76-2877页。

⑥ [汉]班固撰《汉书》卷6《武帝纪》，第188页。

⑦ [北魏]酈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2《河水》，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0页。

⑧ 关于令居塞设置时间还有元狩二年、元鼎六年等其他见解。可参王昱、崔永红《令居塞建立时间考辨》，《青海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第78-83页。

⑨ 酒泉置郡年代众说纷纭，大致存在元狩二年（前121）说、元鼎二年（前115）说、元鼎四年（前113）以降说、元鼎六年（前111）说、太初元年（前104）说、不确定说等六种说法。对前人诸说梳理研究，可参[日]池田雄一著，郑威译《中国古代的聚落与地方行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11-314页。令居设置早于酒泉置郡，或与之同时的前提是肯定元狩二年说。我们认为酒泉置郡当至少在元鼎二年张骞招乌孙归故地失败，归国之后。

武威郡有武威塞。武威县北为休屠泽，武威塞应当就设置于休屠泽一带。《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其明年春，汉使浞野侯破奴将二万余骑出朔方西北二千余里，期至浚稽山而还。”^①《史记索隐》引应劭云浚稽山：“在武威县北。”^②《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引应劭曰：“浚稽山在武威塞北。”^③同样引应劭语标注浚稽山的相对位置，一称武威县，一称武威塞，可见二者概念趋同，位置基本一致。又，《汉书·赵充国传》记载：“又武威县、张掖日勒皆当北塞，有通谷水草。”^④北塞即指河西长城，表明武威郡武威县北有长城亭障穿境而过。《汉书·地理志下》记载武威郡武威县：“休屠泽在东北，古文以为猪野泽。”休屠县：“都尉治熊水障。北部都尉治休屠城。”^⑤由此观之，武威县北有休屠泽，则武威塞很可能即依托休屠泽地利而修筑。另外，休屠县筑有熊水障，北部都尉又治于休屠城，可见休屠县也是武威郡重要的军事基地。《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太初三年（前102）：“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⑥其中居延是指居延塞，而此处“休屠”或指休屠县熊水障，或指休屠县休屠城，抑或指修筑于休屠泽一带的武威塞。

张掖郡有居延塞。《汉书·武帝纪》记载太初三年西汉遣“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⑦。《史记·匈奴列传》亦载此年：“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⑧《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记载：“汉居延县故城在甘州张掖县东北一千五百三十里，有汉遮虏鄣^⑨，强弩都尉路博德之所筑。李陵败，与土众期至遮虏鄣，即此也。”^⑩《汉书·地理志下》张掖郡居延县：“居延泽在东北，古文以为流沙。都尉治。”颜师古注曰：“阨駟云武帝使伏波将军路博德筑遮虏障于居延城。”^⑪《后汉纪·孝明皇帝纪下》记载：“乘出张掖居延塞。”^⑫《后汉书·和帝纪》记载永元三年（91）：“大将军窦宪遣左校尉耿夔出居延塞。”李贤等注云：“居延，县，属张掖郡，居延泽在东北。武帝使伏波将军路博德筑遮虏障于居延城。”^⑬综合以上记载看，居延塞称谓似出现于东汉时期，即指遮虏障，筑于居延泽一带。鉴于匈奴入侵酒泉、张掖的主要通道是经过居延泽，故西汉于此修筑遮虏障。

①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3521页。

②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3522页。

③ [汉]班固撰《汉书》卷6《武帝纪》，第201页。

④ [汉]班固撰《汉书》卷69《赵充国传》，第2978页。

⑤ [汉]班固撰《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第1612页。

⑥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854页。

⑦ [汉]班固撰《汉书》卷6《武帝纪》，第201页。

⑧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3522页。

⑨ “鄣”通“障”，正文统一作“障”。

⑩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3523页。

⑪ [汉]班固撰《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第1613页。

⑫ [晋]袁宏撰，张烈点校《两汉纪》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91页。

⑬ [南朝宋]范曄撰《后汉书》卷4《和帝纪》，第171-172页。

《汉书·地理志下》记载酒泉郡塞城包括会水县偃泉障、东部障与干齐县西部障^①。此外酒泉西部曾置玉门关，后西移敦煌。《史记·大宛列传》记载：

于是天子以故遣从驃侯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至匈河水，欲以击胡，胡皆去。其明年，击姑师，破奴与轻骑七百余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因举兵威以困乌孙、大宛之属。还，封破奴为浞野侯。王恢数使，为楼兰所苦，言天子，天子发兵令恢佐破奴击破之，封恢为浩侯。于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门矣。^②

据《汉书·地理志下》，敦煌郡龙勒县有玉门关，酒泉郡有玉门县。^③即便此处指玉门关，其位置也未必在敦煌郡。史载酒泉列亭障至玉门，而不是敦煌列亭障至玉门，似表明此次修筑亭障是在酒泉郡境内，而不在敦煌郡境内。且学界早已提出西汉玉门关最早设置于酒泉西部之说^④，应是。此次修建亭障偏重军事用途，则玉门应指玉门关。修筑酒泉至玉门关长城亭障的时间是在赵破奴虏楼兰王攻破姑师之后，此前赵破奴出击匈奴时率“属国及郡兵数万”^⑤，至元封二年（前109）击楼兰、姑师时，亦“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⑥。则西汉政府很可能就是利用这支军队修筑酒泉至玉门关间的长城。赵破奴出击姑师、虏楼兰王事应在元封二年，封浞野侯在元封三年（前108）^⑦，因此列亭障至玉门的时间大致就在元封三年，酒泉西部玉门关亦应设置于此年。概言之，酒泉置郡时，河西长城自令居延伸至酒泉郡城以北附近，至元封三年又继续向西修筑至玉门关。

综上，秦汉王朝的西北边塞逐步向西推进，其中秦之边塞以秦昭襄王所筑长城和秦始皇所筑河塞为重要节点。西汉初年西北复以秦昭襄王长城为边塞，汉武帝反击匈奴，至迟到元狩二年恢复秦朝黄河边塞，元狩四年以后又逐步向西修筑长城。河西长城东连秦之河塞，经令居向西逐步延伸至酒泉，乃至敦煌、西域。河西长城沿边还设置一批重要塞城，作为西汉防御匈奴入侵河西及经营匈奴的军事据点。这些塞城在抵御匈奴骚扰河西地区的战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还有部分塞城充当西汉对外交往的关隘。而敦

① [汉]班固撰《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第1614页。

②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849-3850页。

③ [汉]班固撰《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第1614页。

④ 相关研究可参王蕾《汉唐时期的玉门关与东迁》，《西域研究》2020年第2期，第96-108页；张俊民《玉门关早年移徙新证——从小方盘汉简T14N3的释读说起》，《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第92-97页等。今从此说。

⑤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849页。

⑥ [汉]班固撰《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第3876页。

⑦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赵破奴：“后一岁，为匈河将军，攻胡至匈奴水，无功。后二岁，击虏楼兰王，复封为浞野侯。”汉武帝命赵破奴为匈河将军征匈奴事在元鼎六年（前111），“后二岁”，也即元封二年（前109）。《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记载赵破奴：“以匈河将军元封三年击楼兰功，复侯。”《史记集解》徐广在《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后二岁”下注曰：“元封二年。”《史记·大宛列传》“还，封破奴为浞野侯”下注曰“元封三年。”《资治通鉴》亦将该事系于元封三年。这样赵破奴击楼兰还可能发生在元封三年，我们认为元封三年或是赵破奴班师、封浞野侯之年份，元封二年（前109）才是其出击楼兰、姑师的年份。

煌郡设置之初，还不是西汉政府经营西北国的重点。直到元封三年，河西长城才修筑至酒泉西部玉门关，尚未延伸至敦煌郡境内。

二、西汉敦煌郡长城的修筑时间

西汉敦煌郡设置玉门、阳关、中部、宜禾等四都尉，其下又辖大煎都、玉门、平望、破胡、吞胡、万岁等候官管辖长城诸障燧，前人学者对这些问题乃至现存敦煌汉长城的具体走向及众多烽燧具体位置都有较为细致的研究^①。但对西汉敦煌郡长城的修筑年份还存在争议。白音查干认为敦煌长城是元鼎六年（前 111）敦煌郡设置时修筑^②，吴初骧认为元封四年（前 107）王恢封浩侯，同年“酒泉列亭鄣至玉门矣”，即修筑了自酒泉郡至敦煌郡西部玉门关的长城^③。但是经上文考证得知，该“玉门”是指酒泉郡西部玉门关，则上述二说应误。

西汉敦煌郡长城的修筑至少在元封三年“酒泉列亭鄣至玉门”之后，在此之前敦煌郡以“土河”抵御匈奴。敦煌文献 S. 788《沙州图经》记载：“土河，周围州境，汉武帝元鼎六年修，以为匈奴禁限。”^④ P. 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

一所土河

右周回州境，东至磧口亭，去州五百一十里一百步，西至白山烽，去州卅里，南至沙山七里，北去（至）神威烽，去州卅七里。汉武帝元鼎六年立，以为匈奴禁限。^⑤

《通典·兵五·守拒法附》记载：“土河：于山口贼路，横断道，凿阔二丈，深二尺，以细沙散土填平，每日检行，扫令净平，人马入境，即知足迹多少。”^⑥可见土河应属军事防御体系中的侦察设施，它围绕敦煌周边修筑。《汉书·晁错传》记载：“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毋下千家，为中周虎落。”颜师古注云：“郑氏曰：‘虎落者，外蕃也，若今时竹虎也。’苏林曰：‘作虎落于塞要下，以沙布其表，旦视其迹，以知匈奴来入，一名天田。’师古曰：‘苏说非也。虎落者，以竹篾相连遮落之也。’”^⑦居延新简对天田亦有大量记载，如 EPT4: 62 记载：“……隧南界北尽第卅四

① 吴初骧《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第 47-83 页。

② 白音查干《长城与汉匈关系》，第 63-67 页。

③ 吴初骧《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第 17 页。

④ 图版参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教以外部份）》第 2 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165 页；录文参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 年，第 56 页。

⑤ 图版参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 1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第 56 页；录文参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 14 页。

⑥ [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 152《兵典五·守拒法附》，北京：中华书局，2016 年，第 3889 页。

⑦ [汉]班固撰《汉书》卷 49《晁错传》，第 2286-2287 页。

隧北界毋人马来越塞天田出入迹。”^① EPT68: 65 记载：“兰越塞天田出入。”^② 表明西汉西北边塞设置天田作为军事侦察设施，其功用与唐代土河类似，故吴超认为唐土河是对汉天田的继承和延续。^③ 由此推测汉武帝在敦煌设置的防御侦察设施应为天田，而唐代敦煌人或将汉时遗留的天田设施用当时流行的“土河”称谓称之。至于苏林应是将虎落与天田混淆，而颜师古与郑氏观点接近，认为虎落是一种竹篾所制之藩篱，初师宾曾对虎落进行详考^④，今未见西汉敦煌郡设有虎落，故不赘言。如此，元鼎六年西汉置敦煌郡的同时还修筑天田作为防御匈奴的禁限。天田东起磧口亭，北至神威烽，西至白山烽（李正宇认为此烽燧即今敦煌市西南三十里之沙枣墩^⑤），南至鸣沙山。在长城延伸至敦煌郡前，天田作为军事防御侦察设施承担着防御匈奴进犯的重要使命。即便到后来长城修筑之后，敦煌郡天田也应继续发挥着侦察防御职能。

太初四年春（前 101）李广利征大宛取胜后，“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⑥。西汉继续向西修筑烽燧，显然意在建立敦煌西至罗布泊间的预警体系。西汉修建敦煌以西的军事设施也表明此时敦煌郡长城应已基本修筑完成。联系到元封三年时河西长城修筑至酒泉西境玉门关。则敦煌郡长城修筑时间应在元封三年至太初四年间。P. 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对敦煌郡长城的修筑情况也有记载：

古长城，高八尺，基阔一丈，上阔四尺。

右在州北六十三里。东至阶亭烽一百八十里，入瓜州常乐县界；西至曲泽烽二百一十二里，正西入磧，接石城界。按《匈奴传》汉武帝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于乌孙北为塞，以益广因（田）。汉元帝竟宁元年，侯应对词曰：“孝武出军征伐，建塞起亭，遂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即此长城也。^⑦

这则材料表明敦煌郡长城修筑于汉武帝时期，且修筑长城与汉公主妻乌孙王大致同时进行，皆为防御匈奴进犯。如此记载为真，则西汉初次嫁公主给乌孙王也即细君公主出嫁的时间就等同于敦煌郡的长城的修筑的时间。《汉书·西域传下》记载：“汉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以妻焉。”^⑧《资治通鉴》将此事系于元封六年（前 105）^⑨，

① 孙占宇《居延新简集释（一）》，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年，第18页。

② 张德芳、韩华主编《居延新简集释（六）》，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年，第187页。

③ 吴超《天田与土河》，《敦煌研究》2004年第5期，第58-61页。

④ 初师宾《汉边塞守御器备考略》，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博物馆编《汉简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2-222页；

⑤ 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3页。

⑥ [汉]班固撰《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第3873页。

⑦ 图版参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册，第56页；录文参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15页。

⑧ [汉]班固撰《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第3903页。

⑨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1“武帝元封六年”，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714-715页。

那么敦煌郡长城修筑亦约在此年，此年正属元封三年至太初四年间这一范畴。又据文书内容看，敦煌郡长城东起唐瓜州常乐县，到沙州的阶亭烽，大致沿疏勒河到敦煌北六十三里处往西到曲泽烽，足见其工程量之庞大，也表明其修筑过程应当较长。元封三年河西长城延伸至酒泉西界玉门关后，应会紧接着筹备修筑敦煌郡长城。到元封六年细君公主出嫁时这一工程或在继续，或已完成。正因这一时期敦煌郡长城已在修建中或修建完成，来自北方匈奴的威胁得以缓解，西汉才敢经敦煌嫁公主于乌孙。

另外，太初年间（前104-前101）李广利征大宛事件对敦煌郡长城修筑情况也有所反映。太初元年（前104），汉武帝“以广利为贰师将军”^①征大宛兵败后：

引而还。往来二岁，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天子闻之，大怒，使使遮玉门关，曰：“军有敢入，斩之。”贰师恐，因留屯敦煌。^②

结合李广利行军“往来二岁”及其留屯敦煌后“其夏，汉亡浞野之兵二万余于匈奴”^③来看，李广利败归敦煌是在太初二年（前103）。汉武帝“使使遮玉门关”意在将李广利败军阻挡于塞外，以示惩戒。李广利屯田敦煌却在玉门关外，表明此时酒泉郡玉门关正是塞内、塞外分界所在，而敦煌虽已置郡，但因边塞尚未修筑完成，故只可算作塞外孤城。这种塞外筑城情况非敦煌独有，《汉书·武帝纪》记载太初三年（前102）：“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卢朐，游击将军韩说将兵屯之。”^④则五原塞外之列城与酒泉塞外之敦煌城可相比况。并且李广利屯于塞外敦煌之事还反映出太初二年敦煌郡长城尚未修建完成，否则若李广利仍屯于长城之内汉武帝的惩戒便失去意义。

《汉书·李广传》记载李陵：

将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备胡。数年，汉遣贰师将军伐大宛，使陵将五校兵随后。行至塞，会贰师还。上赐陵书，陵留吏士，与轻骑五百出敦煌，至盐水，迎贰师还，复留屯张掖。^⑤

酒泉向西即为敦煌，而史称李陵“行至塞”。其后“出敦煌”也印证了此“塞”是在敦煌郡，当即指敦煌郡长城。如此，李广利二征大宛班师的太初四年，敦煌西部就已修筑长城作为边塞，玉门关也当在此时西迁至敦煌西部^⑥。此年之后，西汉自敦煌郡西境修筑烽燧延伸至罗布泊，这一工程既能保障敦煌、楼兰间的交通安全，也可在一定程度上防御北部匈奴的威胁。

① [汉]班固撰《汉书》卷61《李广利传》，第2699页。

② [汉]班固撰《汉书》卷61《李广利传》，第2699页。

③ [汉]班固撰《汉书》卷61《李广利传》，第2699页。

④ [汉]班固撰《汉书》卷6《武帝纪》，第201页。

⑤ [汉]班固撰《汉书》卷54《李广传》，第2451页。

⑥ 魏迎春、郑炳林《西汉时期的玉门关及其性质——基于史籍和出土文献的考论》，《宁夏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第177-183页。

三、敦煌郡酒泉都尉与酒泉候官相关问题考察

西汉政府在修筑敦煌至罗布泊亭燧工程同时，还在敦煌郡设置酒泉都尉。《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太初四年李广利征大宛取胜后：

而汉发使十余辈至宛西诸外国，……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①

《史记集解》引徐广曰：“一云‘置都尉’。又云敦煌有渊泉县，或者‘酒’字当为‘渊’字。”^②《汉书·地理志下》渊泉县并无都尉设置，且西汉渊泉县地处敦煌郡东部，而这则史料所载“宛西诸外国”“西至盐水”“仑头”等反映的都是伐宛胜利后敦煌西部乃至西域的情况，故此处不为“渊泉都尉”。夏鼐认为应采梁玉绳《史记质疑》所考“置字在都尉上”之说，即敦煌、酒泉两郡置都尉^③。但《汉书·武帝纪》记载太初三年（前102）：“又入张掖、酒泉，杀都尉。”^④表明太初四年之前酒泉早已设置郡都尉。达吾力江·叶尔哈力克结合夏鼐分析指出此处“酒泉都尉”不能理解为“酒泉郡都尉”，理由有三：一是，因敦煌是分酒泉设置，故至少应该说“酒泉置敦煌都尉”，不应反说；二是，酒泉郡都尉早已设置，时间不对；三是，酒泉郡都尉应在酒泉郡治，不能在敦煌；又进一步提出此句意为“敦煌郡酒泉都尉”，并且由于敦煌郡所设四都尉已有明确的控制范围，因此认为酒泉都尉的职责在于管理敦煌至罗布泊一线的亭燧，在此基础上又将酒泉都尉治所定为罗布泊北岸的土垠遗址^⑤。该说认为“酒泉都尉”是指敦煌郡下辖部都尉，应是。但其对酒泉都尉所辖区域及治所位置的观点未必确凿。达吾力江·叶尔哈力克将酒泉都尉范围确定在敦煌至罗布泊一线，是基于马雍提出的西汉敦煌郡西境应当达到罗布泊东岸之说^⑥。然《汉书·西域传上》记载西域：“东则接汉，阨以玉门、阳关。”^⑦即将玉门关、阳关以西划归西域范围。当然这一记载不甚精确，因为西汉于玉门关以西尚有长城烽燧，并设置大煎都候官，马圈湾汉简108记载：“大煎都候障近于西域。”^⑧表明大煎都候官是敦煌郡辖下最西之候官，此地以西方为西域，故言其“近于西域”。大煎都候官既为敦煌郡西界，则酒泉都尉位置自敦煌郡以外寻找显然并不恰当。退一步讲即便西汉敦煌郡能管辖到罗布泊一带，这一地区设

①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2857页。

②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2858页。

③ 梁玉绳《史记志疑》，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447页；夏鼐《新获之敦煌汉简》，氏著《考古学论文集（外一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79页。

④ [汉]班固撰《汉书》卷六《武帝纪》，第201页。

⑤ 达吾力江·叶尔哈力克《汉武边塞与西域屯田——轮台、渠犁屯田考古发现初论》，《历史研究》2018年第6期，第154-166页。

⑥ 马雍《西汉时期的玉门关和敦煌郡的西境》，《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1期，第134-137页。

⑦ [汉]班固撰《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第3871页。

⑧ 张德芳《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198页。

置的也不是酒泉都尉，而是伊循都尉。《汉书·西域传上》记载昭帝元凤四年（前 77）傅介子刺杀楼兰王，更立王弟尉屠耆为新王：

王自请天子曰：“身在汉久，今归，单弱，而前王有子在，恐为所杀。国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愿汉遣将屯田积谷，令臣得依其威重。”于是汉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抚之。其后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①

悬泉汉简 I T0111^②：73 记载：“敦煌伊循都尉大仓谓过所县……□传舍，从者如律令。”^③ 此简印证了西汉确于楼兰伊循城设置伊循都尉，土垠遗址应就近归其管辖，而非归酒泉都尉管辖。若楼兰一带早在武帝太初四年就已设置酒泉都尉，则尉屠耆便可直接依仗酒泉都尉威势而再无必要请西汉政府遣将屯田于伊循，因此达吾力江·叶尔哈力克认为土垠遗址设置酒泉都尉的说法实误，酒泉都尉的驻地还应在敦煌郡境内寻觅。

达吾力江·叶尔哈力克基于敦煌郡设置四都尉且有着明确的控制范围这一固有认识，故而才向敦煌郡以西的西域寻找酒泉都尉驻地。但实际上这四都尉并非是敦煌郡设立之初就同时设置，而是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发展历程才最终形成这一格局。《汉书·地理志下》颜师古注“效谷县”曰：“本鱼泽障也。桑钦说孝武元封六年济南崔不意为鱼泽尉，教力田，以勤效得谷，因立为县名。”^④ P. 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古效谷城。右在州东北卅里，是汉时效谷县，本是渔泽郭，桑钦说：汉武孝（孝武）帝元封六年，济南崔意不（不意）为渔泽都尉，叫人力田，以勤效得谷，因立为县名焉。”^⑤ 可见西汉敦煌郡于元封六年（前 105）前后还曾设置鱼泽都尉，后随效谷县设置而废去，故不在四都尉之列。只此一例便可看出，敦煌郡四都尉及其辖区并非牢不可破的铁板一块，汉武帝时期属于四都尉格局尚未成型之际，于此时的敦煌郡寻找酒泉都尉驻地未尝不可。

《汉书·律历志上》记载武帝太初元年（前 104）：“乃选治历邓平及长乐司马可、酒泉候宜君、侍郎尊及与民间治历者。”^⑥ 《汉书·赵充国传》记载宣帝神爵元年（前 61）：“今诏破羌将军武贤将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将二千人，长水校尉富昌、酒泉候奉世将婼、月氏兵四千人，亡虑万二千人。”^⑦ 西北边塞的“候”是指候官之长官。^⑧ 则酒泉候宜君、奉世应为酒泉候官长官。酒泉候最迟在太初元年已经出现，表明酒泉候官的设置早于酒泉都尉。又，“婼、月氏兵”中的“婼”应指婼羌，“月氏”应

① [汉]班固撰《汉书》卷 96 上《西域传上》，第 3878 页。

② 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悬泉汉简（壹）》，上海：中西书局，2019 年，第 98 页。

③ [汉]班固撰《汉书》卷 28 下《地理志下》，第 1615 页。

④ 图版参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 1 册，第 56 页；录文参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 15 页。吴初骧认为《沙州都督府图经》所载为误，“鱼泽尉”当为“鱼泽塞尉”或“鱼泽障尉”省称，西北汉简中确有“塞尉”“障尉”官职名称。故吴氏之论可备一说，然亦不可因此轻易否定敦煌文献的记载，参氏著《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第 94 页。

⑤ [汉]班固撰《汉书》21 上《律历志上》，第 975 页。

⑥ [汉]班固撰《汉书》卷 69《赵充国传》，第 2980 页。

⑦ 陈梦家《汉简考述》，《考古学报》1963 年第 1 期，第 77-111 页。

指小月氏。婼羌广泛分布在西域南道诸国以南,《汉书·西域传上》记载:“出阳关,自近者始,曰婼羌。婼羌国王号去胡来王。……辟在西南,不当孔道。”^①《汉书·西域传下》记载:“又去胡来王唐兜,国比大种赤水羌,数相寇,不胜,告急都护。都护但钦不以时救助,唐兜困急,怨钦,东守玉门关。玉门关不内,即将妻子人民千余人亡降匈奴。”^②可证婼羌毗邻敦煌郡西境,酒泉候能率婼羌兵出征,似表明酒泉候官设置于敦煌郡西部边陲。如此,敦煌郡酒泉都尉很可能在酒泉候官的基础上扩充设置。酒泉候官设置较早又行用酒泉之名而不用敦煌之名,表明其设置时间可能在敦煌郡设置之前。推测此前酒泉候官所在应是酒泉郡设置于敦煌地区的亭燧一类,其后敦煌郡设置后仍沿用旧名^③,并随着长城亭燧的修筑完善发展为酒泉候官、酒泉都尉。候官治所称“候城”,亦称“鄣”或“障”^④,则酒泉候官很可能以酒泉障为治所。又据《汉书·地理志下》敦煌郡龙勒县“有阳关、玉门关,皆都尉治。”^⑤则酒泉候官还可能设关为治,而酒泉都尉治所有可能即为酒泉障或酒泉关。《史记·大宛列传》在记载伐宛胜利后敦煌西部乃至西域的情况时专门提到敦煌郡置酒泉都尉,也说明酒泉都尉应设置于敦煌郡西部,且敦煌郡设置酒泉都尉很可能与下句“西至盐水,往往有亭”有所关联,即自酒泉都尉驻地至罗布泊之间修筑亭燧。如是则新置的酒泉都尉应位于敦煌郡长城西端,其职责诚如达吾力江·叶尔哈力克所言应在于管理敦煌至罗布泊一线的亭燧。关于这一推测还有其他史料佐证。

《汉书·武帝纪》记载天汉二年(前99):“夏五月,贰师将军三万骑出酒泉,与右贤王战于天山,斩首虏万余级。”^⑥颜师古注引晋灼曰:“(天山)在西域,近蒲类国,去长安八千余里。”^⑦李广利出兵攻打东天山蒲类国附近的匈奴右贤王,行军路线最短最方便的是走唐伊吾道,而不是从远在东边的酒泉郡经戈壁荒漠穿越马鬃山到达东天山。如此,李广利或经敦煌郡酒泉都尉管辖的塞城出塞,而非经酒泉郡出塞。汉武帝多次派遣军队出酒泉击匈奴,《汉书·匈奴传》记载征和三年(前90):

重合侯莽通将四万骑出酒泉千余里。……重合侯军至天山,匈奴使大将偃渠与左右呼知王将二万余骑要汉兵,见汉兵强,引去。^⑧

《元和郡县图志·陇右道下》“伊州”条记载:“东南取莫贺延碛路至瓜州九百里。正南

① [汉]班固撰《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第3875页。

② [汉]班固撰《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第3925页。

③ 《汉书·地理志下》武威郡下辖张掖县,可与敦煌郡下辖酒泉都尉相比况,也表明这种情况在河西不足为怪,二者所反映的都是新郡设置后与故郡相关地名仍在当地的延续使用的一种现象。

④ 张文瀚《出土文献视野下的汉代候官探究》,《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99-105页。

⑤ [汉]班固撰《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第1614页。

⑥ [汉]班固撰《汉书》卷6《武帝纪》,第203页。

⑦ [汉]班固撰《汉书》卷6《武帝纪》,第203页。

⑧ [汉]班固撰《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第3778-3779页。莽通原名马通,因谋反,后人易姓为莽。

微东至沙州七百里。”“天山，一名白山，一名折罗漫山，在州北一百二十里。”^①以距离推算，唐沙州（敦煌）至伊州以北的天山合计 820 唐里。唐里（540 米）大于汉里（415.8 米）^②，则此处里程又可折算为约 1065 汉里。这与出酒泉千余里抵达天山的记载基本吻合，可印证马通率军“出酒泉”应是自敦煌郡酒泉都尉辖地出塞。又，《汉书·匈奴传》记载本始二年（前 72）汉宣帝派遣“后将军赵充国为蒲类将军，三万余骑，出酒泉。……蒲类将军兵当与乌孙合击匈奴蒲类泽。乌孙先期至而去，汉兵不与相及。蒲类将军出塞千八百余里，西去候山，斩首捕虏，得单于使者蒲阴王以下三百余级”^③。赵充国征伐匈奴至蒲类泽、候山。蒲类泽（即蒲类海，今巴里坤湖）位于天山“山北二十里”^④，候山具体位置不详，然其应距离西汉与乌孙的预设战场蒲类泽不远，否则若相去甚远难以达到东西合击匈奴的目的。马通出酒泉千余里至天山，而赵充国出酒泉至天山北二十里的蒲类泽一带却需要“千八百里”，距离差异如此大的原因应在于马通所出酒泉和赵充国所出酒泉属于两个地域概念。马通所出酒泉当是敦煌郡酒泉都尉所在边塞，而赵充国所出酒泉当指酒泉郡边塞，故在里程上才会出现 800 里的差距。

关于酒泉都尉驻地，前文已大致推定于敦煌郡西部。联系到汉武帝后元年间（前 88—前 87）西汉政府才将玉门关由敦煌郡西南移至西北小方盘城一带^⑤，所以我们推测酒泉都尉及下辖酒泉候官所在边塞有可能是敦煌郡西北玉门关的前身，也有可能是与之邻近的大煎都候官前身。敦煌小方盘城汉简 T14N3（敦 2438）记载：

□长。酒泉玉门都尉护众、候畸兼行丞事，谓天隙，以次为驾，当舍传舍，诣行在所。……廐以传信，从事如律令。^⑥

敦煌汉简 1922A 号简文记载：“大始三年闰月辛酉朔乙卯，玉门都尉护众，谓千人尚、尉丞无署，就。”^⑦此处玉门都尉即指玉门关都尉^⑧。护众任玉门都尉的时间在武帝太始三年（前 94）前后，而其在任期间玉门都尉仍归酒泉郡管辖，其后玉门都尉接受敦煌郡管理而不再加“酒泉”之名，则太始三年（前 94）前后正是玉门都尉及玉门关西移至敦煌西部的时间。而酒泉候官最迟在太初元年（前 104）已设置于敦煌郡西部，不久酒泉都尉也得以设置。这就意味着在玉门都尉西移敦煌郡之前，酒泉都尉应当承担着保障敦煌郡西部边塞安全沟通西域的职责，后到玉门关及玉门都尉设置于敦煌西北，此项

① [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 40《陇右道下》，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 1029 页。

② 汉、唐里换算采自李并成《汉居延县城新考》，《考古》1998 年第 5 期，第 82—85 页。

③ [汉]班固撰《汉书》卷 94 上《匈奴传上》，第 3785—3786 页。

④ [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 40《陇右道下》，第 1030 页。

⑤ 魏迎春、郑炳林《西汉时期的玉门关及其性质——基于史籍和出土文献的考论》，第 177—183 页；郑炳林、司豪强《敦煌通史·两汉卷》，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23 年，第 95—107 页。

⑥ 张俊民《玉门关早年移徙新证——从小方盘汉简 T14N3 的释读说起》，第 94 页。此释文为张氏融合诸家释文所作。

⑦ 敦煌汉简简文可在《敦煌汉简》（北京：中华书局，1991 年）《敦煌汉简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等相关出版物中检索，页码不再赘注。

⑧ 参郑炳林、司豪强《敦煌通史·两汉卷》，第 101 页。

职能随之移交。那么酒泉都尉很可能就是被新置的玉门都尉兼并取代，因此《汉书·地理志》不载酒泉都尉。

酒泉都尉在武帝末年被西迁的玉门都尉取代后，酒泉候官却仍旧保留至宣帝时期。王国维、吴初骧认为玉门都尉辖玉门、大煎都二候官^①，应是。然这一格局的形成应在宣帝时期。敦煌汉简 1948 记载：“大始元年十二月辛丑朔戊午，煎都亭□。”何双全据此推测武帝太始元年（前 96）此地仅设煎都亭而尚未设置大煎都候官。应是。同时何氏还考证该候官设立时间当在宣帝本始时期^②，其依据是敦煌汉简 1808 所载：“本始六年三月癸亥朔，丁丑尽辛卯，十五日，乙酉到官。”因此简出土于今后坑一带，属大煎都候官范围，又因此处称作“官”，故而何氏推测此时宣帝设置大煎都候官。本始年号仅有四年，此处本始六年实际上是地节二年（前 68）。何氏仅据“到官”认为此地已置候官不确，汉代官吏上任普遍称作到官，如《汉书·王尊传》记载：“以高弟擢为安定太守，到官。”^③居延汉简 479.11 记载：“十一月八日，第三隧长嘉迹到官，毋人马。”^④皆属此类，由此得知该简“官”并非专指“候官”。事实上大煎都候之名最早见于宣帝五凤时期。敦煌汉简 1598 记载：“神爵五年十二月壬申，大煎都。”敦煌汉简 1729A 记载：“五凤元年□月戊寅，大煎都候齐谓部士吏□□□史亭燧□□，遣令□□行塞……”神爵年号仅有四年，五年即五凤元年（前 57）。此二简是目前出土有明确纪年汉简中关于大煎都候的最早记载，表明大煎都候官的设置最早可追溯至宣帝五凤元年。

《汉书·赵充国传》所见神爵元年（前 61）酒泉候奉世是关于酒泉候官的最晚记载，此后酒泉候再未见载于史；大煎都候官的设置时间目前仅能追溯至五凤元年（前 57）；武帝太始三年（前 94）前后存在玉门候说明玉门候官彼时已经设置，玉门候官应当亦在武帝末年随着玉门关、玉门都尉的西移而移动至小方盘城一带，其依据是早期酒泉郡玉门候的资料在小方盘城出土，表明玉门候官资料也随着候官搬迁至小方盘城^⑤。可见酒泉候官与玉门候官曾并存于世，由此可排除酒泉候官是玉门候官前身的可能。与此相对的是酒泉候官与大煎都候官的存在时间一前一后，并不重合。而前文已推定出酒泉候官也应地处敦煌郡长城西端，很可能与大煎都候官地域范围重叠。由此推测酒泉候官应是大煎都候官的前身，酒泉候官为大煎都候官取代的时间范围是在神爵元年（前 61）至五凤元年（前 57）之间。

酒泉候官早于大煎都候官设置于西汉敦煌郡长城西端之事，亦可从其他史料中得到

① 王国维、罗振玉撰，何立民点校《流沙坠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53-54页；吴初骧《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第48页。

② 何双全《论西汉敦煌玉门关的三次变迁》，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简牍学研究》第3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47-262页。

③ [汉]班固撰《汉书》卷76《王尊传》，第3228页。

④ 简牍整理小组编《居延汉简（肆）》，台北：“中研院”史语所，2017年，第105页。

⑤ 除 T14N3 号简外，敦煌汉简 1921 亦载：“四月乙巳，玉门候畸移过所，□”

印证。西汉扬雄《解嘲》称：“今大汉左东海，右渠搜，前番禺，后陶涂。东南一尉，西北一候。”颜师古注引孟康曰：“敦煌玉门关候也。”^①孟康以为西北一候应指玉门关候，《汉书·律历志上》颜师古注“酒泉候宜君”称：“宜君亦候之名也。候，官号也。故曰东南一尉，西北一候。”^②表明西北一候也有可能是指酒泉候。^③扬雄是在介绍西汉疆域边界时提到西北一候，因此孟康为其作注时首先将位置定在了敦煌两关中位于西北方位的玉门关。这种看法虽有一定道理，但忽视了《汉书·地理志》所载的两关格局出现时代较晚，并且即便是敦煌西北设置玉门关后，成为西汉西北极的也并非玉门关候，而是大煎都候官。颜注时代较晚，然而却注意到酒泉候或为西北一候的正解，这应当是颜师古基于酒泉候出现较早且酒泉都尉设置于敦煌西部这些信息得出的模糊印象。我们认为扬雄所谓“西北一候”很可能是阅读西汉早期资料后化用之典，它很可能正如颜注所云是与酒泉候官挂钩，意在反映武帝时期酒泉候官曾长期作为西汉最西北端候官的历史现实。甚至在玉门关西移之前，酒泉候官很可能是敦煌郡西北端最早且唯一设置的候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作为西汉敦煌郡西北部孤立的军事基地。同时酒泉候官也是武帝乃至昭帝、宣帝早期西汉边疆西北极所在，故称其“西北一候”正是点明酒泉候官曾经充当西汉西北极的重要历史地位。而宜君被西汉政府选中造《太初历》除其可能善于“治历”外，很可能也与其任官地理位置便于观测西汉西北极天文现象有关。

四、结语

基于上述考证，我们可以一些基本的结论或推论：汉武帝反击匈奴、拓地西北，约在元狩二年（前121）恢复秦朝黄河边塞，并于元狩四年（前119）后又逐步向西修筑长城，是为河西长城。河西长城东连河塞，西抵敦煌乃至延伸到西域。河西长城沿边还设置一批重要塞城，作为西汉防御匈奴入侵及经营匈奴的军事据点。而敦煌郡长城作为河西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修筑时间应在元封三年（前108）至太初四年（前101）间。

元封三年前的敦煌郡因为长城尚未延伸至此，故而实际上仅可算是西汉西北塞外屯垦据点，随着西汉对西域联系的加强，敦煌地位逐渐提高，长城修筑事宜随之提上日程。长城修筑完成之前，敦煌郡主要依靠“土河”也即天田工事防御匈奴，同时也有零星屯田机构设置。如最迟于元封六年（前105）设置的鱼泽都尉，最迟于太初元年（前104）设置的酒泉候官。还有早在敦煌置郡前的元狩三年（前120），敦煌界渥洼池

① [汉]班固撰《汉书》卷87下《扬雄传下》，第3568-3569页。

② [汉]班固撰《汉书》卷21上《律历志上》，第977页。

③ 王子今已关注到“酒泉候”与“西北一候”之间有所关联，只是未作深究。参氏著《论“西北一候”：汉王朝西域决策的战略思考》，《西域研究》2021年第1期，第67-80页。

一带就已有以南阳新野暴利长为代表的屯田军队于此驻扎^①。这些军事屯田机构分布于敦煌郡城的东北、西北、西南方位，对于敦煌郡早期的安全防卫工作发挥着关键作用。

太初四年征宛得胜之际，西汉敦煌郡长城已经修筑完成，于是又开始修筑敦煌西至罗布泊的亭燧，以保证敦煌至楼兰间道路的安全。这段亭燧与敦煌郡长城西端，应当皆隶属于同年设置的酒泉都尉管辖。酒泉都尉应以酒泉候官为基础进行设置，而酒泉候官应是敦煌郡西北部设置最早的候官，其目前确定存在时段为太初元年（前104）至神爵元年（前61）间，后至迟到五凤元年（前57）为新置的大煎都候官取代。因酒泉候官曾长期作为西汉边疆西北极，故疑扬雄所谓“西北一候”即指此也。

西汉敦煌郡长城的修建目的应与打击匈奴、连通西域的战略相关。敦煌郡长城沿线还设置有玉门关、鱼泽障、昆仑障等关塞。这些关塞既便于驻守军队巡狩候望，又能作为军队征讨的出发地，同时还能为经此往来的官员、使团、士卒、商旅提供安全保障并核验通关之人身份。因此西汉敦煌郡长城关塞不仅发挥着军事防御职能，还拥有政治外交、商贸往来、文化交流等多重使命。

^① 郑炳林、司豪强《敦煌通史·两汉卷》，第18-20页。